

中国文化在 启蒙时期的英国

Chinese Culture
in
Britain during
the Period of Enlightenment

范存忠◎著



中国文化在 启蒙时期的英国

Chinese Culture
in
Britain during
the Period of Enlightenment

范存忠◎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 / 范存忠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447-1481-5

I. ①中… II. ①范… III. ①中英关系—文化交流—
文化史—研究 IV. ①G125 ②G156. 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9008 号

书 名 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
作 者 范存忠
责任编辑 韩继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1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 www. yilin. com](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 www. ppm. cn](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375
插 页 2
字 数 174 千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481-5
定 价 2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序一

范存忠先生(1903—1987),字雪桥、雪樵,上海市崇明县人,是我国英语语言文学界的著名学者和教育家。

他热爱祖国,在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相信科学与民主。以后,他考取庚款公费留学,进入哈佛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师从 Fred Robinson、Irving Babbitt、John Livingston Lowes、Bliss Perry、G. L. Kitteredge 等人。在美期间,除学英语、法语外,他还学习德语、拉丁语、古法语、古德语、哥德语等。1931年,他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1931—1949年,他历任中央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文学学院院长等。他在比较文学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就。他研究中国文化对英国的影响,目的是要发扬光大祖国的文化。英国知名学者,牛津大学博得礼图书馆馆长,世界著名的《约翰逊索引》编著者鲍威尔,与范存忠先生有深厚的友谊。解放后,鲍威尔先生邀请范存忠先生和妻子林凤藻去英国工作,范存忠先生婉言谢绝了。

他公正无私,一贯作风正派。他不徇私情,不搞宗派,兼容并蓄,爱惜人才,具有蔡元培先生的宽广胸怀和办学风度。1944年,他应邀赴英国牛津大学讲学一年,系统介绍了中国古代哲学、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对西方的影响。在牛津大学讲学时,他认识了年轻的留学生徐诚斌。回国后,他便去信聘请徐诚斌先生到中央大学任外文系教授。众人不服,范存忠先生安排了一次学术报告,徐诚斌先生水平超众,大家便信服了。

1956 年高等教育部实行教授级别评选,范存忠先生被选为中国英语文学界唯一的一位一级教授。1958 年 3 月,他被国务院任命为南京大学副校长,以后又兼任图书馆馆长、文科学术委员会主任、文科学报编委会主任、国立中央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1958—1987 年,他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南京市政协委员、民盟南京市主任委员、民盟江苏省副主任委员,并多次连任南京市政协副主席。他还参加全国群英会,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继续被选为四、五、六届代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他爱护后辈,要求严格。若有人找他谈专业问题或治学方法,他不仅愿意接连数小时毫无保留地与人交流自己的见解和心得,而且还介绍他们参考大量国内外各种新旧图书杂志。有时他还亲自为别人去图书馆查找资料。就在他病逝的前几天,他还带着哮喘病上图书馆四楼为研究生查找书籍。1983—1987 年,他辞掉了很多职务,致力于学术研究和著书立说。他的著作深入浅出,是珍贵的文化遗产。他治学严谨,学识渊博,使学生觉得他是那么的坚实可靠,是名实相符的世界水平的学者。

范存忠先生在南京大学英语系执教近 60 年,曾讲授写作、小说、散文、诗歌、文学史、语言史、英国史、翻译和专题研究等课程。主要著作有《范存忠英语学习十二讲》、《近代英国散文选》、《英国史提纲》、《英国文学史提纲》、《英国语言文学论集》、《英国文学论集》、《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及其他论文译著。其中《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则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源于范先生的博士论文。范先生在留学美国期间花了两年时间,用英文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文化对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的影响》的论文,于 1931 年初夏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这篇论文中的“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流行的中国戏”部分 1940 年刊登在《青年中国季刊》二卷二期 172—186 页;“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流行的中国思想”部分 1941 年刊登在国立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一卷一期 1—22 页与一卷二期 111—138 页。

当时,范存忠先生写这篇论文的目的是向西方学者弘扬中国文化,

并用科学的方法去考证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对英国的影响。范先生在书中通过对英国政治家、散文作家坦普尔爵士三篇著作的阐述论证了这一观点:第一篇中坦普尔爵士谈政府的起源与性质,认为“为政在人”,这与中国儒家学说相近。第二篇中坦普尔爵士歌颂孔子,说孔子是杰出的天才;歌颂中国,说中国是“知识的总汇”;这为英国的启蒙运动提供了参考资料。第三篇中坦普尔爵士在谈论法国与荷兰的几何图案式园林布置的同时,介绍了中国的风景花园,西方已有学者认为这些都是欧洲浪漫主义的来源之一。范存忠先生这篇论文引导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方向及以社会和历史为背景来考察文学作品的相互影响。范先生在1931年论文的基础上,加上他进一步研究的论文,花了数年的时间进行了整理、修订和扩充,于1987年春完稿。这就是今天《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的版本。这本书详尽论述了中西文化的源流及其相互影响,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上海外国语学院顾雪帆先生和李良佑先生的关心下,《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1991年4月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第一版。此书出版后,获得了第六届中国图书奖,并于1995年获得了国家教委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一书对比较文学的研究现在仍具有很大的影响。译林出版社的顾爱彬社长和赵薇主任为了能让此书再版,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能读到这本书,做了很多的努力,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林凤藻

1989年12月21日于南京

范家宁 王 英

2010年7月修订于芝加哥

- 林凤藻先生(1915—1997)系范存忠先生之夫人,原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
- 范家宁先生系范存忠先生之子,现为高级IT工程师,电子信箱:fanjianing26@hotmail.com。

序 二

范存忠先生在 20 世纪 20 年代舍工学文,“立志要在英国语言文学领域内作出贡献”。在长达近 60 年的学术生涯中,他致力于英国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成为我国英语界、比较文学界的杰出学者。

范存忠先生受过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完整系统的训练,是 20 世纪我国外国语言文学界少数几个拥有西方著名大学博士学位者之一。1926 年冬,他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外国语文系,获学士学位。1928 年,他从美国伊利诺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后,入芝加哥大学,学习英国古典文学暑期课程,任课教授是克兰(R. S. Crane)。克兰从 1935 年至 1947 年任芝加哥大学英语系主任,领导课程改革,是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学派批评思想的基础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在课堂教学中,克兰注意培养学生的鉴别能力。50 多年后,范存忠先生依然记得当年克兰上课时,“往往把新近发表的书评在堂上散发,要求大家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是克兰把他“领上研究工作的阶梯”。范存忠先生显然得益于克兰的教学方法,常说:“学习一定要有心得体会。小至一孔之见,大至发明创造,总要有自己的心得才好。”1928 年秋天,他进入哈佛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学习,撰写题为《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的博士论文。范存忠先生在国外大学接受严格、正规的训练,使他接触到国际学术研究前沿,掌握严谨的研究方法,为他后来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1931年范存忠先生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秋天回国,在中央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任教授。1949年解放之后,范存忠先生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这体现在他对笛福、菲尔丁、约翰逊、彭斯、布莱克、拜伦、雪莱、狄更斯等作家及其作品研究上。范存忠先生在研究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不盲从教条,在极左思潮泛滥的五六十年代,做到持论公允,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极其难能可贵。例如,苏联学者安尼克斯特曾认为鲁滨孙是一个劳动者又是一个资产者。范存忠先生在《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1960)论文中对此持不同意见,指出:鲁滨孙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他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人物,旺盛、自信,具有‘开张骏发’的新气概”。范存忠先生关于布莱克“富有革命性的诗篇”的论述,对拜伦与雪莱创作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的分析,对狄更斯作品反映19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之讨论,都是在“详尽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与作者的思想倾向加以考虑”,因此,他的观点比较令人信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读范存忠先生的每一篇文章,我们发现都有大量注释。他的引文均有出处,字字有来头,这在那个时代的外国文学评论文章是不多见的。范存忠先生在谈到自己做学问的体会时说:“我们要对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切忌盲从。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深刻领会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另一方面又要对原著作全面而详尽的研究和分析。”这一番话对今天的青年学者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正是因为范存忠先生做学问从读原著作出发,他的文章内容丰富充实,论点言之有物,并常常介绍一些新的材料,如《鲁滨孙漂流记》第二卷里鲁滨孙的远东与中国之行、彭斯的讽刺诗、鲍斯威尔的近代传记等,而这些在当时国内的外国文学评论界都是被人忽略的。范存忠先生凭着他扎实的理论积累和对中外文学的渊博学识,深入探究英国文学。他的论著做到了厚积薄发,学术性强,真正有所发现,能代表时代水平。

范存忠先生研究英国文学的一个特点是立足中国,关照中国,这使他进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在西学东渐,国人鄙视中国文化、崇洋迷外的年代,范存忠先生并没有人云亦云,而是独辟蹊径,去探讨西方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古老中华文明影响这一课题。早在20年代,他的博士论文便是选择研究中英文化关系。回国之后,他发表了《约翰逊、高尔斯密与中国文化》(1931)、《孔子与西洋文化》(1932)、《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流行的中国戏》(1940)、《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流行的中国思想》(1941)等论文。1944年,范存忠先生去英国牛津大学讲学,系统介绍中国古代哲学、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对西方的影响。他在英国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杂志先后发表“Percy's *Hau Kou Chouan*”(1946)、“Sir William Jones' Chinese Studies”(1946)、“Chinese Fables and Anti-Walpole Journalism”(1949)等文章,在英国产生影响,使他成为走向国际学术界的中国学者。17、18世纪西方开始介绍中国文化,中西文化开始发生影响。这种影响总体来说,是间接的、渐进的,但确实存在。约翰逊、伏尔泰、哥尔德斯密斯等重要人物对中国思想文物表现出很大兴趣,写文章介绍评论中华文明,从而成为文化交流的桥梁。范存忠先生选择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评论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他们,揭示中华文明在西方哲学思想、政治体制、文学戏剧、生活风尚等领域引起的变化。范存忠先生热爱祖国,发自内心的民族自豪感促使他关注中国文学与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把视角投向中西文化交流的起始阶段,研究西方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接受过程,走在了时代前面。

范存忠先生治学严谨,任何结论都是建立在对材料的具体分析的坚实基础上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搞比较文学研究的路子,即影响研究。范存忠先生是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学派在中国的开拓者。他注意到平行研究容易出现牵强附会、使比较成为比附的现象,在自己的研究中,重视收集真正发生过影响的史料。范存忠先生发现: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历来谈两国文化的关系时,往往难于具体。有鉴

于此,他在探讨中英两国文化交流和互相影响的历史时,“力图作出明确而具体的阐述”。范存忠先生逝世后出版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充分体现了他“明确而具体”的研究风格。已故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教授称该书为“研究中英两国文化交流的不朽之作”。范存忠先生在书中首先谈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作品里有关中国的记载。讨论笛福时详细介绍《鲁滨孙飘流记》中关于鲁滨孙到中国、到南京的描述。在评述杜赫德的《中国通志》,马诺瑟的《赵氏孤儿》,哈切特、伏尔泰、谋飞的改编本《中国孤儿》,珀西的《好逮传》,哥尔德斯密斯的《世界公民》等章节里,范存忠先生旁征博引,以事实立论,就中国思想文物对18世纪英国社会的影响,作出了“比较完整而具体的综合性论述”。

范存忠先生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并不停留在材料的简单罗列。他指出:

对关系和影响可以作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什么?二是怎样?三是为什么?譬如谈关系,不光是谈什么关系,也要谈关系是怎样发生的,以及为什么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把所研究的东西讲得深透些。

在讨论《赵氏孤儿》在欧洲的流传时,范存忠先生不仅详尽论述了该剧在西方改编、上演以及上演后引起的批评反响等具体过程,还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深入分析中国戏剧在欧洲受欢迎的原因,阐发哈切特、谋飞等人改编本的意义和作用。范存忠先生由此得出结论:“哈切特的《中国孤儿》是4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斗争中的产物,在反抗瓦尔帕尔的运动中发生作用。它是采取戏剧形式的讽刺作品之一,表面上是一个东方故事,实际上揭露了瓦尔帕尔专政时代的政治现实——贪污、腐化、搜刮、剥削、政客的险恶与民间的疾苦——在历史上有一定价值。”¹⁷ 17世纪后期开始,英国开始对中国不规则的园

林发生兴趣。范存忠先生从启蒙时期英国处于变化中的艺术风尚、审美趣味这一角度去审视英国对中国园林的接受情况。在讨论中国的思想文物与哥尔德斯密斯的《世界公民》时,范存忠先生也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分析哥尔德斯密斯如何通过他创造的中国哲学家李安济对欧洲(特别是英国)社会进行切中时弊的评论,阐明“其现实的意义”。范存忠先生从不孤立地去观察问题,而是将研究对象置于历史语境之中,由表及里,探究特定的文学、文化现象发生的原因,理清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使他的比较文学研究很有深度。

1983年,我考取范存忠先生的研究生,有幸成为他的学生。虽然我于1984年秋赴英国留学,但还是有机会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当面聆听他的教诲。范存忠先生当时已是80多岁的老人,但给我们几个研究生讲授18世纪英国文学,思维依然十分敏捷,音容笑貌,宛在眼前。范存忠先生排除种种干扰,踏踏实实,潜心做学问,真正是我们的典范。

范存忠先生于1987年12月21日去世。哲人已去,文心永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著述日渐显示出其不朽价值。范存忠先生在英国文学、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的开拓性工作,对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下研究中西文学文化的相互融会、吸收、碰撞和影响,具有启迪意义。范存忠先生的道德文章为我们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王守仁

目 录

序一	林凤藻 范家宁 王英	1
序二	王守仁	4
第一章 认识中国的开始，坦普尔爵士与中国		1
一、从乔叟时期到弥尔顿时期		1
二、中国文化开始发生影响		7
三、坦普尔爵士与孔子学说		13
四、坦普尔谈中国的园林		18
第二章 孔子学说与中国的自然神论		25
一、“中国人事件”		25
二、柯林斯、廷德尔、兰姆塞		31
三、博林布鲁克勋爵		36
四、博林布鲁克的游从：蒲伯和伏尔泰		41
第三章 揄扬声中的驳论与嘲讽		48
一、为基督教进行辩护		48
二、《飘流记》的作者——笛福		52
三、安逊的环球航行及其影响		57

四、中国是“基督的敌人”？	60
第四章 杜赫德的《中国通志》	65
一、《中国通志》及其英译本	65
二、约翰逊与《中国通志》	70
三、中国故事与英国的政党斗争	76
四、《一篇非正式的论文》	82
第五章 室内装饰与园林布置	89
一、茶、瓷器、室内装饰	89
二、艾迪生与蒲伯论园林	95
三、园林艺术的风尚在演变中	100
四、钱伯斯论中国园林	108
五、关于中国园林的影响	114
第六章 中国的戏剧（上）	120
一、《牺牲》、《中国之征服》、《仙后》	120
二、《赵氏孤儿》及其外文译本	123
三、法国文艺界对于《赵氏孤儿》的评论	128
四、英国文艺界对于《赵氏孤儿》的评论	132
第七章 中国的戏剧（下）	139
一、哈切特的改编本《中国孤儿》	139
二、《中国孤儿》的政治意义	142
三、歌舞杂耍：《中国的节日》	147
四、伏尔泰的改编本《中国孤儿》	151
五、谋飞的改编本《中国孤儿》	154
六、谋飞的《中国孤儿》上演成功	159
第八章 珀西的《好速传》及其他	168
一、《好速传》的英译本	168

二、《好逑传》的主题、思想和作用	172
三、中国的语言文字、诗歌及其他	178
第九章 哥尔斯密与《世界公民》	184
一、《中国人信札》的写作与发表	184
二、《世界公民》的形象	189
三、哥尔斯密与中国的思想文物	193
四、《世界公民》中对英国社会的批评	200
五、哥尔斯密的贡献与局限	207
第十章 威廉·琼斯爵士与中国文化	215
一、开始学习汉语	215
二、继续学习汉语的计划	219
三、翻译《诗经》，研究中华民族问题	223
四、未完成的研究计划	228
附录 人名和书刊名译文对照表	234

第一章

认识中国的开始，坦普尔爵士与中国

一、从乔叟时期到弥尔顿时期

我们谈中国和英国的文化关系，可以从乔叟时期（1340—1400）谈起。乔叟写作坎特伯雷故事的时候，马可波罗那部有名的中国游记已在欧洲到处传诵了。乔叟的《侍从的故事》（*The Squire's Tale*）提到成吉思汗，不是没有原因的。故事说，成吉思汗东征西讨，曾同俄罗斯打过仗。他那个人勇敢、贤明、富有、守信、仁爱、公正、稳健，就像大地的中心一样；又说，他年轻、活泼、坚强、善战，就像朝廷中的任何一个战士。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名阿尔加西夫，幼子名成巴尔，女儿名肯纳茜。故事开场时，成吉思汗已经在位二十年了。三月十五日是他的生日，那天天朗气清，他在首都隆雷，高坐堂皇，主持一个盛大的宴会。忽然来了一个战士，骑着一匹铜马，手里拿着一面宽大的玻璃镜，大拇指上戴着一只金戒，身旁挂着一把明剑，一直冲到皇座前面。文武百官，鸦雀无声，都被那个武士吓呆了。原来，武士带来了四件法宝。先

说铜马,你骑上那匹马,要到哪里,它就会把你驮到哪里。玻璃镜呢,能使你看到别人心里想些什么,能使你分清敌友。戒子呢,能使你懂得禽鸟的语言。至于那把明剑,它能使你医治任何创伤。后来,阿尔加西夫骑了那匹铜马,立了不少战功。肯纳茜因为有了玻璃镜、戒子和明剑,发现了一只已被雄鹰抛弃而痛不欲生的苍鹰,把它医好、养好。故事有趣,可惜没有讲完,因而引起后来诗人斯宾塞和弥尔顿的怀念。

但是必须指出,这里除了几个人名而外,东方的事物是不多的。故事的轮廓很像《高文爵士和绿衣武士》,那个骑马来到鞑靼可汗面前的武士就好像那个骑马来到亚瑟王圆桌前面的绿衣武士。故事里描绘武士的几个字眼如“年轻、活泼、坚强、善战”,以及他带来的几样法宝,都是欧洲中世纪传奇文学中常用和常见的东西,并没有多少东方特色。很可能,乔叟听到过一些关于东方的传说,而在创作《侍从的故事》的时候,并没有参考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①。我们从乔叟的整个作品来看,他心目中最遥远的东方是印度而不是中国。比如《玫瑰传奇》(*The Romaunt of the Rose*)里说:“哪怕你一直跑到印度,你也不可能找到更芬芳可爱的园子了。”^②《公爵夫人之书》(*The Book of the Duchesse*)里说:“公爵夫人谁都敬爱,未出家门一步的人是这样,远涉重洋而到达印度的人也是这样。”^③在《赦罪僧的故事》(*The Pardoner's Tale*)里,死亡神说:“他走遍天下,从英国到印度,也没有找到一个人愿意把青春和老年对调的。”^④在《巴斯妇的故事》(*The Tale of the Wyf of Bathe*)里,巴斯妇说,她和她第五个丈夫,在历尽艰辛之后,言归于好,他对她百依百顺,她对他也忠贞不贰,“从丹麦到印度再也没有那样一个人”^⑤。这里,最远的地区是印度而不是中国。《公爵

夫人之书》里还提到两个东方的地名,一个是“瀚海”(Dry Sea),另一个是“喀拉湖”(The Carrenare)。八十多年前,哈佛大学洛厄斯教授花了好多时间进行考察,后来得出结论:那两个地方离我们的北京都达一千英里以上^⑥。

大约从十世纪初年起,欧洲人通称中国为“契丹”(Cathay),称中国人为“契丹人”(Cathayan, Cataian)。这在历史上是有根据的。在中国,唐朝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是中原分裂混乱的时期,叫做五代十国(907—960)。以后,南方是宋(960—1279),北方是辽(960—1125)和金(1115—1234)。辽原名契丹,这是欧洲人所谓“契丹”的来源。后来,蒙古人统一了中国,辽和金已不存在,但是有不少欧洲人沿用旧名,仍称中国与中国人“契丹”与“契丹人”。“契丹人”一词,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至少见过两次。首先,在《第十二夜》(*The Twelfth Night*, 1599—1600)第二幕第三场里,托比爵士和一些同伙,在奥利维亚小姐的屋子里,深更半夜寻欢作乐。小姐的侍女玛利亚跑去干涉,说:“你们这样猫儿叫春似的闹些什么?要是小姐知道了,一定会叫管家马伏里奥把你们赶出家门。”托比听了不服,说:“小姐是个契丹人;我们都是政界要人;马伏里奥是个昏头昏脑的家伙……”

莎士比亚还有一次提到“契丹人”。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 1600—1601)第二幕第一场里,那个有名的福斯塔夫(Falstaff)同时向两个中年妇女——福德太太和培琪太太——调情,同时把一封情书分别送给两家,弄得她们莫名其妙,而福德和培琪听到之后也是将信将疑。下面是他们两人的一段对话: